

本刊歡迎海內外學者就反
腐敗問題，為「二十一世紀評
論」或「學術論文」欄目撰稿。

——編者

曇花一現的「亞洲和親會」

周麗卿的〈清末革命運動與亞洲觀的遇合：以「亞洲和親會」為個案的討論〉（《二十一世紀》2014年12月號），力圖通過同盟會「東京派」於1907年成立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所主導的「亞洲和親會」這一個案，揭示出身處異域的知識人一種獨特的亞洲地緣政治觀。

倡導「亞洲和親會」的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人所主張的中、印合作模式，某程度是對日本的亞洲主義言說一種承續性的反動。然而，正如周文所指出的，「亞洲和親會」的目標，既有對外的層面（反帝），又有對內的向度（反抗民族強權），這裏便牽涉到了清末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多重性解讀。「亞洲和親會」的主張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滿漢之爭、華夷之別，而擁有了「反強權」的普世價值關懷。

然而，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亞洲和親會」的主張，尤其是其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面，則顯得有些「不接地氣」。章太炎等人對於其主要聯合對象印度的體認，更多是局限於其與身在日本的流亡印人的接觸，抑或其對於在印度早已退居支流的佛教的偏好與認同。由此看來，此種聯合的實際效應如何已不難想見，「亞洲和親會」的曇花一現驗證了這點。

謝一峰 上海

2014.12.24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虛黨化的黨軍混合體制

李翔的〈東施效顰：新聞局制下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二十一世紀》2014年12月號）一文，對1946年6月到1948年2月間國民黨軍隊的政工體制——新聞局制作了一個梳理。該文認為國共兩黨的領軍方式，最初都師從蘇俄，都強調以黨領軍。但中共與軍隊的關係能夠做到黨指揮槍，黨軍關係是化合的，體現中共的組織力、動員力、控制力及信仰力逐漸增強，真正朝着強勢革命政黨方向發展。國民黨則不一樣，黨軍關係前期以俄為師，後來以美為師，從俄式政工體制到美式政工體制，黨軍關係是割裂的，都學得四不像，其組織力、動員力、控制力及信仰力都比較虛弱，是為真正的弱勢革命政黨。

可以說，從前後兩個時間段來看，國民黨作為革命黨，其黨軍體制其實就是一種「虛黨」為特質所形成的特殊的黨軍混合體制。這種混合體制一直貫穿於國民黨在大陸的執政與統治，甚至到台灣亦在延續。其間，蔣介石多次根據外在形勢變化，努力建成一個強勢政黨，擺脫虛化的窘境，以便奪取、建立及鞏固全國性的

政權，都未獲得成功。國民黨這種虛黨化的黨軍混合體制產生的歷史文化基礎是甚麼？其間遇到哪些難以克服的歷史困境？在後來國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再向民主黨轉型的過程中又提供了哪些有利的資源支撐？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黃文治 合肥

2014.12.17

一個批判性的評估

潘志平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個批判性的評估〉（《二十一世紀》2014年12月號）對1944年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個地區成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進行了全景式掃描，認為這場暴動本質上屬於旨在分裂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範疇。這與中國大陸把該事件（「三區革命」）定義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定斷有一定出入。

潘文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事件本質上是外來因素驅動的近代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也與新疆本土複雜的歷史文化積澱有着深刻的聯繫。在外，當時蘇聯出於種種考慮向「三區」提供了物資、武器甚至

軍事技術援助，並利用新疆該區域民族、宗教的複雜局面進行了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互利」運作；在內，清末民初，境外的「雙泛」和近代民族主義思潮通過「扎吉德」教育大舉入疆，在造就維吾爾族第一代現代知識精英的同時，配以自清朝開始的伊斯蘭信仰與中華認同的錯位，第一批「東突」骨幹也因此被「培植」而出。

中國大陸對該事件的研究尚缺乏深刻的切入，而西方學界對該問題可能更習慣採用「內部殖民與抗爭」的二元分析，這使得對該領域的這段歷史觀察更顯迷障。潘文所提供的豐富信息，與其說是結論，不如說是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

林琳 廣州
2014.12.18

化解革命，尋求共識

任劍濤的〈向左與向右：中國政治的價值選擇〉（《二十一世紀》2014年12月號）一文，系統梳理了當代中國政治在「左」、「右」選擇上的背景與現狀，並在社會與思想界的左轉傾向描述基礎上，對中國未來改革發展如何化解「革命」提出建設性意見。

就整體而言，任文的論述更多地從「左」的一面切入，且側重對「左」的批評與反思。從「出現普遍的左轉傾向」的國際社會政治氛圍，到執政黨所決定的「國家形式結構上的左傾特質」；從經濟發展陷入「轉型陷阱」的社會，到學術界的「極左派」與「新左派」合流；以及左派熱衷「反美」和「崇毛」（以「重慶模式」為代表），如是種種，均引起作者的警惕與擔憂。我們

看到，作者更傾向以「中左」，即「同意的革命」觀點來調和左右。另一方面，相應地留給「右」的篇幅較少，這種論述失衡多少偏離了題意。儘管如此，文章仍不乏亮點，如對以新權威主義為代表的「右派」所主張的英雄式改弦更張的革命形式的批判，讓我們對兩年來的政治現實有了更本質的把握。然而，文章對於「左」、「右」長期鬥爭的歷史和由此形成的個體與集體記憶，未曾觸及。尤其是1949年以來「右派」創傷歷史的評價以及對現狀與未來的影響，並不是不重要的。

黃勇 廣州
2014.12.20

徘徊在「道」與「勢」之間

周質平的〈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二十一世紀》2014年12月號）利用第一手史料，描述民國時期政治領袖蔣介石和自由主義思想家胡適長達數十年的交往過程。在史料鉤沉中，我們得以看到蔣、胡等人更具真實感的歷史情景。

然而，周文也有值商榷之處，如「以道抗勢」、「以道輔政」的提法內涵模糊，易使人陷入一種以道德主義為評判標準的定式。同時，周文試圖以和權力（權威）的關係來界定知識人之間的分歧，並把胡、林二人相對立，這是對知識人之間分歧的一種誤解。知識人之間的差異主要源於他們對主義、信仰、文化認同上的不同看法，從而影響他們和政治權力的複雜關係。

在思想史意義上，即政治哲學的「主義」意義上，林語堂沒有太大的參照價值。政治在

林的生命中從未佔據核心位置，他是一個追求閒適、生活情趣和品味的文人，林和蔣的私人關係更多是性情和環境所致。而胡適則一直徘徊在自由主義之「道」和政治權力之「勢」之間。胡曾多番與權力中心走得很近，但每次權力運行軌道偏離他的憲政民主理想時，他又能及時抽身而出。這正是胡適妥協溫和、張弛有度卻不失立場的佐證。

王英 西安
2014.12.17

致謝

《二十一世紀》謹在此向2014年曾協助評審投稿的專家學者致以謝意：卜永堅、卜偉華、尹翠琪、文貫中、王奇生、王俊秀、王笛、王劍凡、任劍濤、伍國、朱滋源、朱濤、吳木鑾、宋永毅、宋明煒、宋耕、李金銓、李達嘉、李懷印、沈旭暉、周永新、周保松、周遜、周濂、岳經綸、林啟彥、林蘊暉、胡泳、胡嘉明、孫宏雲、孫萬國、孫歌、翁松燃、馬軍、高王凌、高崢、高默波、張千帆、張光、張春田、張英進、張健、張堂錡、張樂天、張歷君、張靜、曹樹基、梁中堂、習超、莫家良、許紀霖、郭于華、郭偉聯、陳永發、陳沃聰、陳建華、陳學然、陶然、黃亦兵、黃宗智、黃俊傑、黃英偉、楊天石、楊欣、楊奎松、楊貞德、楊際開、董國強、趙雲、劉光臨、劉季倫、劉智鵬、潘光哲、鄭會欣、蕭知緯、賴駿楠、應星、羅永生（按筆畫序）。